

· 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 ·

【德】G. G. 莱布尼茨

中国近事

——
为了照亮我们这个
时代的历史

NOVISSIMA
SINICA

Historiam nostri temporis
illustratura



大象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中国近事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 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 ·

〔德〕G. G. 莱布尼茨

中国近事

——为了照亮我们这个
时代的历史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德)莱布尼茨著;
(法)梅谦立,杨保筠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7
(国际汉学研究书系·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任继愈等主编)
ISBN 7-5347-3857-1

I. 中... II. ①莱... ②梅... ③杨... III. 中外关系—文化交
流—文化史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3279 号

中国近事/G. G. 莱布尼茨[德]

主 编 李文潮[德] 张西平

译 者 梅谦立[法] 杨保筠

特约编辑 侯 明

责任编辑 沈 顿

责任校对 E 琴 方 波

书籍设计 王 云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制 版 郑州艾乐出版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8.875

插 页 1

字 数 196 千字

印 数 1—2 100 册

定 价 17.80 元(平) 22.80 元(精)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351

总序

任继愈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世界知道中国,不自今日始,回溯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共有五次高潮。^① 文明交流的深度、广度也是近代超过古代。

中外文化交流,也循着文化交流的规律。一般情况下,文化水平高的一方会影响文化水平低的一方,文化低的一方则比较容易成为接受者。中国古代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往是施与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其间也有双方文化水平相当,接触后发生冲突,然后各自吸收有用的,并使它为我所用的情况。这种水平相当的交流,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收到互相融会、双方受益的效果。进入近代,中国科技领域在国际不再领先,往往借助外来文化补充自己的不足。明中期,如天文、历算,往往学习西法,这就是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又一个实例。

文化交流、交融、吸收、互补,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有在国力充实、文化发达、科学先进的情况下,才可以在交流中采取主动,吸取

① 第一次在汉朝,公元前后1世纪,开通了丝绸之路;第二次在唐朝,公元7—8世纪;第三次在明朝,公元14—15世纪;第四次在清末鸦片战争前后,19世纪;第五次在“五四”前后,从20世纪初到现在。

其可用者为我所用。当国势衰弱、文化停滞、科学落后时,往往在交流中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失去对外来文化选择的主动权,成为完全被动的接受者。鸦片战争以后,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有些是我们主动吸收的,也有些是中国所不愿接受的,也有些是被迫引进的。

历史告诉人们,当前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世界上一个地区出现了经济危机,全世界都会受到震动。文化方面虽然没有达到这样的紧密程度,却也有牵一发动全身的趋势。当前文化交流的条件大大超过古代,传递手段之迅捷,古人无法想像。因此,文化交流的责任也远比古代社会沉重。“国际汉学研究书系”负担着 21 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艰巨任务。

为了涵盖古今汉学进展的全面状况,本书系分为三个系列:

- 一、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翻译);
- 二、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翻译);
- 三、海外汉学研究丛书(著作)。

“汉学”这一名称,国内外学术界多数人认同,也有少数学者有不同意见。我们不准备用很多精力界定这个名词,我们只是把过去和现代人们已发表的和正在从事研究的这一类译著汇集起来,总之,都属于中国文化这个大范围内的学术著作。正如“现代新儒家”,这个名字的内容,海内外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标准。因为它属于中国文化这个领域,本书系也将包括这类译著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愿借这个领域,作为联系海内外研究古今中国文化的桥梁,能为人类精神文明略尽绵薄之力,我们的初衷就算达到了。

我们这套书系,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类未来负责的心愿,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同时也向中国展示健康、高品位的世界文化。21 世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总结历史成果的时代。我们以科学的良心,如实向世界推进文化交流,我们介绍古代先驱者的业绩,在当代人中,我们沟通各国文化的精华,展望人类未来的光明前景。

只有在健康、光明、理性、科学为主干的文化指引下,人类才可以避免失误,走向和平。每一个经历过世界大战的过来人,深知和平的可贵,战争的罪恶。我们从事文化事业的、正直善良的学者,出版这套书系,期望其社会效益不限于书斋以内,更寄希望于提高全人类的文化素质,泯除非理性的强权暴行,引导社会走向和平、光明的大道。为中华民族积累精神财富,为世界人民增加友谊与理解。

“大象国际汉学研究书系”

编辑委员会

- 顾问:** 陈乃芳 (Chen Naifang) 陈翰笙 (Chen Hansheng)
季羨林 (Ji Xianlin) 李学勤 (Li Xueqin)
饶宗颐 (Rao Zongyi) 汤一介 (Tang Yijie)
王元化 (Wang Yuanhua) 周一良 (Zhou Yiliang)
- 主编:** 任继愈 (Ren Jiyu)
- 执行主编:** 张西平 (Zhang Xiping) 周常林 (Zhou Changlin)
耿昇 (Geng Sheng) 杨煦生 (Yang Xusheng)
- 国内编委:** 程裕祯 (Cheng Yuzhen) 高建平 (Gao Jianping)
顾钧 (Gu Jun) 何其莘 (He Qixin)
李明滨 (Li Mingbin) 李雪涛 (Li Xuetao)
柳若梅 (Liu Ruomei) 孟华 (Meng Hua)
任大援 (Ren Dayuan) 汪前进 (Wang Qianjin)
谢方 (Xie Fang) 严安生 (Yan Ansheng)
阎纯德 (Yan Chunde) 严绍璿 (Yan Shaodang)
杨保筠 (Yang Baoyun) 张国刚 (Zhang Guogang)
周发祥 (Zhou Faxiang) 朱政惠 (Zhu Zhenghui)
- 国际编委:** 李福清 (Boris L. Riftin) 何莫邪 (Christoph Harbsmeier)
孟德卫 (David E. Mungello) 许理和 (Erik Zürcher)
常志静 (Floria C. Reiter) 杜德桥 (Glen Dudbridge)
陈志让 (Jerome Chen) 施舟人 (Kristofer M. Schipper)
谢和耐 (Jacques Gernet) 柳存仁 (Liu Ts' un-yan)
钟鸣旦 (Nicolas Standaert) 罗致德 (Otto Ladstätter)
魏丕信 (Pierre-Étienne Will) 史华罗 (Paolo Santangelo)
安乐哲 (Roger T. Ames) 陈荣照 (Tan Eng-Chaw)
罗多弼 (Torbjörn Lodén) 杜维明 (Tu Weiming)
弥维礼 (Wilhelm R. K. Müller) 伊维德 (Wilt L. Idema)

祝贺莱布尼茨《中国近事》中文本出版

中国是东方最具智慧的国度,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在莱布尼茨看来,中国在科学技术、国家治理、伦理道德、政治实践诸方面均具有难以超越的才智与经验,中国人成功地在实践中应用了所谓的自然神学。《中国近事》就是要把欧洲的眼光导向这个伟大的国度与民族。《中国近事》中文本的出版,可以说是伟大的欧洲学者莱布尼茨为了促进欧洲与中国之间的交流与互补而用汉语做出的第一个贡献。

1697年出版的这本书,就是要让欧洲的学者们走近中国;书中的资料有些是莱布尼茨通过直接通信获得的,有些是辗转收集到的,有些则是莱布尼茨自己的研究所得。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促使莱布尼茨这样做的,并不是民族之间为了优先地位的竞争,更不是为了统治其他民族的战争;莱布尼茨想到的,是民族之间的互补与交流,是用一盏灯点明另一盏,交流的目的是民族之间的共同福祉与进步。因此,莱布尼茨的这一思想来自于对完美的热爱,也就是说是来自于“使人类更加完美”的信念,意在于宗教、科学、政治诸领域找出一条可以为人类的普遍进步服务的道路。这是与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及宗教狂热主义完全不同的。

表现在《中国近事》中的这一基本思想同时构成了莱布尼茨《政

治文集》的基本主题。在由德国数个莱布尼茨文集编辑部共同编辑的《莱布尼茨著作书信全集》中,《政治文集》是《全集》的第四个系列,其编辑工作由波茨坦编辑部完成。《中国近事》的第二版(1699)不久也将在这个系列中出版。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近事》的中文版是值得自豪与骄傲的,因为它不仅是直接从拉丁原文翻译为中文的第一部莱布尼茨的著作,同时也是自1699年以来第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事》版本。波茨坦编辑部的同事们为这个版本做出了一点微薄的贡献,为此我们感到高兴与自豪。作为《政治文集》的编辑人员,我们知道莱布尼茨在世也会为此感到高兴的,因为通过《中国近事》中文本的问世,促进世界范围内学者以及科学家们的共同合作,为全球范围内科学知识与思想的交流做出贡献,应该是合乎莱布尼茨的夙愿的,正如他在1712年给俄国沙皇彼得大帝的一封信中写道的:“我不属于那些眼睛里只有自己的祖国,只有某个具体民族的人,我关心的是整个人类的命运与福祉……我的兴趣与着眼点始终是人类整体的进步。”

莱布尼茨终生关注中国的文化与发展,曾寄厚望于古老的中国。我期望《中国近事》中文本能够成为莱布尼茨在寻求人类福祉的途径中走向中国的一个开端;期望中国的学界能够在未来的年代里更多地关注对莱布尼茨这位伟大的数学家、法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科学家、政治活动家的研究。

德国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
波茨坦莱布尼茨文集编辑部主任
哈特穆特·鲁道夫 博士
(Dr. Hartmut Rudolph)

莱布尼茨《中国近事》中文本序

哥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do Guilelmo Leibnitio, 1646—1716)是17—18世纪欧洲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之一,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伟大人物,被后人誉为“千古绝伦的大智者”。在莱布尼茨的学术生涯中,对中国的关注与热情是其整个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当时的欧洲,很少有人像莱布尼茨这样对欧洲和中国两大文明的交流倾注如此大的热情。他认为入华传教士们的重要任务就是“大力促进相隔万里之遥的两大世界的交流,即学术交流与相互启发的工作”^①。在1691年给入华传教士闵明我的信中,莱布尼茨写道:“我认为,在相距遥远的两大洲民众之间进行一些才华与学识上的交流,主要靠您和您的同事们的贡献。众所周知,这比其他因素重要得多。你们把我们发明的数学传到了中国,可是我希望你们也给我们带点什么,尤其是自然知识一类的东西,使欧洲人的学理得以充实,我毫不怀疑,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中国人在这一方面能有所作为。”^②作为一名哲学家,莱布尼茨看重的是中国和欧洲

^① 1689年11月12日莱布尼茨致利国安的信,见 Herausgegeben von Rita Widmaier, *Leibniz Korrespondiert mit China: der briefwechsel mit den Jesuitenmissionaren (1689 - 1714)*, Frankfurt am Main 1990, p. 11。以下凡引该书,出处同此。

^② 同上,第12页。

两大文明的交流,而不仅仅是香料、丝绸等贸易,他认为在中国的传教是使徒时期以来最伟大的事业,他在1697年写给法国耶稣会东方传教负责人维利乌斯(Antoine Verjus, 1632—1706)的信中说:“我十分赞赏和关心贵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因为我觉得它是如今最伟大的事业,不仅为着上帝的荣耀,为着福音的传播,更有利于人类的幸福,有利于我们欧洲与中国各自科学与技艺的成长,这就像文明之光的交换,能在短时间内让我们掌握他们奋斗几千年才掌握的技能,也让他们学会我们的技艺,丰富双方的文化宝库。这都是超出人们想像的光辉伟业。”^①莱布尼茨认为欧洲人和中国人各有长短,他说:“他们以观察见长,而我们以思考领先;正宜两好合一,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②

开阔的学术视野,博大的文化胸怀,使莱布尼茨成为当时欧洲知识界中“以最大的顽强精神持之以恒地关心中国的人”^③。不可否认,莱布尼茨在许多方面把中国理想化了,这是在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当时他对中国的认识也并不都是一种闭门所思的乌托邦幻想。我们从他的书信中可以得知,他了解中国信息的渠道很多,他不仅和人华耶稣会士闵明我、利国安、白晋、洪若翰、杜德美、刘应等有直接的通信,和当时耶稣会东方传教事务的负责人维利乌斯、郭弼恩有着密切的交往,时常了解在中国传教的动向,而且他和当时普鲁士驻俄罗斯的外交官,和荷兰、英国与中国有着外交及商业关系的人物都有着广泛的联系。他掌握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可能比耶稣会东方传教事务的负责人维利乌斯和郭弼恩还要多些,至少我们可以说莱布尼茨是当时欧洲掌握中国情况最多的人之一。正因如此,当代法国著名学者艾田蒲说:“在1700年前后,关注中国的人之中,莱布尼茨无疑是最了解实情、最公平合理的一个,他的著作也是惟一一部

① 同上,第55页。

② 同上,第12页。

③ 维吉尔·毕诺著,耿昇译:《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85页。

我们今天还可以阅读的著作。”^①

《中国近事》正是一部这样的著作。这部 1697 年出版的著作，语言为拉丁文，原文书名为“*Novissima Sinica: Historiam nostri temporis illustratura*”。第一版出版时除了莱布尼茨撰写的著名序言外，还收集了传教士所写的五封信和曾作为俄罗斯外交官员到中国访问过的荷兰商人伊德斯(Evert Isbrand Ides)所写的俄罗斯考察团在中国的旅行报告。

1697 年，法国入华耶稣会士白晋奉康熙皇帝之命回欧洲招募新的传教士来华，在欧洲期间，索邦大学的博士皮克(Piques)先生将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介绍给白晋。白晋读完书后很兴奋，1697 年 10 月 18 日，他给莱布尼茨写了第一封信，并通过维利乌斯将信转交。^②他在信中说：“我读了好几遍，每次都会发现新的乐趣。您热心地了解并宣传在中国传播福音取得的进展，希望在中国皇帝的支持下让整个帝国归信基督教，为感谢您这一片好意，请接受一本我不久前刚出版的有关中国那位伟大君主的小书，我想这本书您应该会喜欢。”^③白晋所说的“小书”，就是他写的并打算呈献给路易十四的《中国现任皇帝传》(又称为《康熙皇帝传》)。

莱布尼茨收到白晋的信以后十分高兴，一个多月后他给维利乌斯回信，表示希望和白晋建立联系，不到两个月，即 1697 年 12 月 21 号他亲自给白晋写信，表示在《中国近事》再版时会收入白晋的作品，他在信中说：“我会非常高兴，如果像您上封信里说的那样，您对书中某些内容，或是序言，或是增补部分有什么意见或建议，请不吝赐教，我会非常感激。”“您说要寄给我您已出版的有关中国皇帝的作品，能在我的书里增加这样一段中国皇帝的小传，真是太完美了。

① 艾田蒲著，钱林森、许钧译：《中国之欧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上册，第 385 页。

② 参阅 Claudia von Collani, P. Joachim Bouvet S. J. :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s72 ; Steyler Verlag, 1985.

③ 同上，第 47 页。

我也十分期待您关于中国皇帝颁布‘容教诏令’并允许自由传教前因后果的新作。我对您给予我的恩惠深表感谢,惟愿自己不致辱没您对我的好意。希望您的大作不仅用法语,也用拉丁语出版,让更多的民众都能拜读、受益。”^①

两年后,莱布尼茨就出版了《中国近事》的第二版,并把白晋的《中国现任皇帝传》翻译成拉丁文收入了其中。

莱布尼茨出版《中国近事》的思想意图是很清楚的,即告诫欧洲思想和宗教界,要了解中国,学习中国的长处,促进欧洲和中国两大文化的交流。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的:“我认为这是命运之神独一无二的计划,人类文明和最高雅的文化今天应该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Tschina’(人们这样称呼它)。也许天意注定如此安排,以至于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和相隔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也会把它们两者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带入一种更好的生活理念。我相信,这绝不是偶然的,即借助其辽阔疆土把中国同欧洲连在一起,并统治着北冰洋沿岸那些北方不文明的地区的俄罗斯人,应该通过他们当今统治者和教会牧首的精诚努力,就像我所理解的那样,致力于仿效我们的功绩。”^②

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出版已经三百多年了,关于莱布尼茨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及白晋所写的《康熙皇帝传》已经有了多种译本,^③也有了对这本书较好的研究著作,^④但很遗憾,至今我们还未看到一个完整的拉丁文的全译本,无论是英文、德文或是法文。现在《中国近事》拉丁文的第一个全译本在中国以中文形式出版了,这是

① 同上,第59页。

② 见本书莱布尼茨的序言,参阅安文铸、关殊、张文珍编译:《莱布尼茨和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3—104页。

③ 见书中梅谦立和杨保筠的译者序。

④ 李文潮、H·波塞尔编:《莱布尼茨与中国:〈中国近事〉发表3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2年;孟德卫著,张学智译:《莱布尼茨和儒学》。很遗憾,这本书的中文版将原作者的所有的注释和参考书统统删去了,使中文版失去了学术史价值。对比一下李文潮所编的书,可看出差距之大。

一件很值得庆贺的事,就是莱布尼茨也会感到欣慰的。

出版《中国近事》的中文本在学术上表明了我们以下的态度:

第一,我们在做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必须从原典出发,必须首先做好基础性的工作。16—18 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对中国学者来说主要的困难是语言问题,但如果我们总是回避这个问题,总是从英文或其他二手文献入手来研究,我们对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水准就会受到限制。所以,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将 16—18 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典的翻译,或者说将西方早期汉学的原典的出版列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中国近事》的出版就是这一理念的证明,其实,类似这样的作品还有《中国的使者——卜弥格》,此书目前只有波兰文和中文;《中国来信》,此书只有拉丁文、捷克文和中文。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出版只有波兰文和中文的《卜弥格文集》;只有意大利文和中文的《卫匡国全集》、《马国贤文集》等,我们只有在原典翻译上下工夫,真正突破语言的屏障,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才有更大的发言权,从而使中国学者在外文文献的使用上也可以超过一些仅仅使用英文的西方学者。^① 正像目前在 16—18 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于葡萄牙语文献和历史的研究方面,最好的学者是中国的金国平和吴志良一样。相信经过一代人的不懈努力,我们会实现这个理想。学术的建设是一件急不得的事,只能一步一步走,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在未掌握这些基本的原典文献前,任何对这一领域的研究都是过渡的著作。我们必须以平和的心态正视我们在这一领域中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同时又应从整个学术的全局出发,推进学术的发展和建设。

其二,应全面把握 16—18 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16—18 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中西之间较为平等的一次对话,入华传教士所做的工作并不仅仅是把西方文化传到了中国,同时也把中国文

^① 并非所有西方学者都可以使用法文、德文阅读,更不用说使用意大利文、波兰文和捷克文阅读,这样中文译本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

化传向了西方,特别是随着当时“礼仪之争”的日益白热化,中国的经典文献被大量翻译成西方文字出版。正像中国文化第一次遇到西方文化后所产生的各种反应一样,西方文化在遇到了中国文化后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反应。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就是这种反应的一个证明。所以,在研究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时,决不能仅仅局限在中国基督教史这个范围内,将中国人如何接受或反对基督教作为研究的中心。^①这仅仅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一个方面。我们研究的视野应将中国的基督教史与中国的近现代史和欧洲的早期汉学史、欧洲的近现代史放在一个历史的平面上加以考察。近年来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已经这样做了,如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彭慕兰的《大分流》。但在文化和思想研究中还没有这样做。相反,一些学者用赛义德的《东方学》来否认西方汉学,并以拒绝“欧洲中心主义”为由,否认传教士汉学文献的重要性。这显然是片面的,实际上正是从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开始,西方人才真正意识到中国文明的伟大与悠久,如果说西方人在美洲发现的是土地,那么在东方发现的是文明。不可否认,传教士的汉学著作有着强烈的宗教色彩,但正是从传教士汉学开始到今天的绝大多数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不断研究,才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壁垒。当然,在无论是传教士汉学还是今天的西方汉学中,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甚至以一种殖民主义的心态来看中国、研究中国文化的大有人在,这在19世纪的汉学著作中特别明显。但不能由此就像赛义德那样,把整个西方汉学意识形态化,将西方汉学全部判断为“沾着殖民主义血的学问”,从而否认了从传教士汉学开始,西方汉学在对中国的认识进程中实际知识的进步与发展;否认了从16世纪开始,经传教士介绍到西方的中国文化

^① 2001年在北京召开的“相遇与对话: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议上既有“西学东渐”的内容,也有“中学西传”的内容,但在论文集仅仅编入了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和理解的论文,而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和理解有很好的论文也未收入,但论文集却以《相遇与对话》为标题。

对催生欧洲近代文化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①而否认了这一点,恰恰是加强了西方中心主义,将西方近代以来的进步与发展神化,忘记了从16世纪开始,在贸易全球化初备的背景下进行的中西思想与文化的互动与影响。

读一下莱布尼茨的这本书吧!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里的论述表明,上帝并不是只把金苹果给了西方人,欧洲近代思想是在吸收了东方思想,特别是中国的思想后才形成的。这一定论的成立实际上从根本上瓦解了“西方中心主义”。从另一方面来说,即使在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中也要仍然关注西方汉学的文献或者说传教士的西方语言文献,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所提供的大量第一手清初的天主教史和清史的文献,就是在今天看来也仍是很珍贵的。

在《中国近事》中文版出版之际,我要感谢完成工作的各位学者与同事。杨保筠先生1999年就首先将白晋的《康熙皇帝传》从法文原版译出,并在《国际汉学》第五辑上发表;法国年轻的汉学家,现任美国Fordham University讲师的梅谦立先生费五年之功,终将最难翻译的莱布尼茨的前言以及其他拉丁文部分译成中文。作为一个汉学家,用中文出版自己的作品,应是对他学术能力的最切实的肯定。当然,我在这里必须提到为梅谦立的中文译文付出诸多心血的侯明女士,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她的润笔和修改,本书几乎是不可能出版的。她和梅谦立的合作很像当年的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翻译《几何原本》。我这样写丝毫不会降低梅谦立的重要作用和基本的翻译工作,而是一种严肃的学术态度。^②

理应得到我的谢意的,还有德国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波茨坦莱布尼茨文集编辑部(主任哈特穆特·鲁道夫博士以及我的朋友、

① 这样的研究在中国也有,这些学者不能分清传教士汉学及西方汉学的多重作用,而只借赛义德的理论,将全部西方汉学乌托邦化。

② 近年在国内出版了一些外国汉学家用中文写作的著作,据我所知,在书出版的过程中中国学者为其付出了大量劳动,但在出版说明中却往往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种做法似也不妥。